

# 回到日常生活世界

## ——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及其局限\*

戴雪红

---

**[提 要]** 加拿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采取女性的立场论,对传统社会学排除女性的主体经验进行批判,聚焦于日常生活世界,力图改变社会学家思考世界和从事研究的方式,建构一门女性主义社会学。本文重点讨论以史密斯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理论、研究方法与经验研究上达到的成就以及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女性的立场 女性主义社会学 经验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12)05-0205-07

---

### 一、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挑战

1970年代早期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影响社会学的话语。但是当女性踏入社会学时,遭遇一个困难:她们发现社会学的著作仅仅反映男性的行动与经验。通过考察社会学“鼻祖”的历史传统,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发现,传统社会学既是性别盲,也有性别成见。因此,自1970年代起,经典社会学首先遭受来自女性主义的挑战,反对“男性主流”的社会研究,并针对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诸多批判。女性主义者批评了传统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中的“男性化”、“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倾向。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抽象的、特定的男性思考方式,即他们自身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得出有关社会与世界的“客观”论点。因而,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另辟蹊径,提出由下而上的知识,采取特殊的认识论,将目标放在创造一种由女性主义观点出发,并能够渗入女性主观性与经验的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对她们而言,重点在于以女性认识、经验社会世界的方法,理解社会世界——生产一种在形式、内容与目的,均不同于男性中心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即“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sup>①</sup>

---

\* 本文系2010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ZXB005)“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前沿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社会学中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者是加拿大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史密斯致力于发展“女性的立场理论”（women's standpoint theory）理论，较不着重于性别与权力的结构，而强调日常生活的性别实现。史密斯解释了女性“的”（of）社会学，与“为”（for）女性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异，提出“一种为女性利益的社会学”，而非一种女性的社会学，或关于女性的社会学，并极力着重日常社会里的女性经验，对这些经验的理解，将形成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主题，而且从女性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时，重点在于不可抹煞女性身为主体的主观性。

20世纪60-70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符号互动论、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各种思潮盛行的时代，史密斯利用与吸收了这些非女性主义传统的洞察，但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符号互动论者，不是一个现象学社会学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不是一个常人方法论者”<sup>②</sup>。史密斯把这些研究的视角整合起来，“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学的思考和探究模式的新方法进行工作”，生产出她自己真正的女性主义视角。这种折衷主义倾向明显地丰富了她的著作，从而向传统的社会学提出了挑战。史密斯对社会学的激进批判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 二、从女性的实际生活出发的立场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复兴

史密斯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者中的马克思，其思想主要受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作为问题化的日常世界：女性主义社会学》（1987）一书中，将学术植根于女性与弱势者的立场，从她们的每日每夜生活的实际性（actuality）中提问，出发点是女性的实际生活。史密斯所构想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将把女性对于其身处的特定环境、社会关系及日常活动之自觉作为社会知识之起点，遵循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观点：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实际的个体活动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史密斯不仅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扩张至以女人经验为基础的认识论，也开启了一条意识形态批判之路。

史密斯的立场论企图寻找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或原因，从女性的经验追溯到统治关系。史密斯引用马克思而提出她的观点：对于女性的工作视而不见，正说明了社会学话语的组成与她所谓的统治关系是“合谋共犯”。不过，史密斯涉入马克思主义并非为了深化女性主义对后资本主义的理解，而是为了挪用马克思对统治思想的论证。因此，史密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在“直接从经验中认知的世界……与罗织并强加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作为思考与想象此一世界之工具的思想与想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sup>③</sup>。女性在其白天与夜晚日常生活世界中所知道的与所经历的经验，与官方所知道的女性在符号、形象、词汇、男权文化的表现之间，存在一种“错误的界线”。相应地，女性倾向于用一种断裂的意识生活。而在论证社会学论述与统治关系之共谋时，史密斯以这条“错误的界线”为出发点，坚持话语层面与人的实际经验，或实际行动之间的区别。她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通常从文本媒介的话语中，寻找一个立场作为研究的起点。因此，社会学既是被扭曲的结果，也是扭曲的祸源。经验与经验的主体两者都落在文本之外或之后，而文本则是事实与话语之间的中介<sup>④</sup>。

史密斯将无产阶级的立场类比女性的立场“在从统治经验中获得的意识形式与从替统治创造条件的经验中获得的意识形式之间存在着差异。”<sup>⑤</sup>史密斯认为“女人的立场是独特的，而且对社会学的活动而言，有其独特的意涵”<sup>⑥</sup>。对史密斯而言，女性的立场特别指涉一个依赖私人领

域与公共领域分离的分工——一个特殊的分工。没有其他立场能像女性的立场这样，特别以被压抑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因此，研究的出发点是某个或某群特殊的人的实际经验，而研究的终点即是对统治关系的分析。史密斯提议，研究需要聚焦在“实际发生的世界，能够被观察、被谈论，以及能够回返，以便检查一项陈述是否正确，或者已有的说法是否能忠实呈现它在实际上的运作……”<sup>⑦</sup>。

### 三、重视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经验：现象学作为理论来源

为了进一步分析统治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和其他群体的立场，史密斯还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现象学、现象学社会学与常人方法论等结合在一起，如晚期胡塞尔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阿尔弗雷德·舒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所体现出来的对经验的关注等，发展了一种忠于女性经验的研究方法——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从个体及其自身有意识的经验出发，并试图避免种种先验预设、倾向和哲学教条。现象学始终以视域性的方式关注着生活世界。从许多方法看，舒茨延续了胡塞尔的思维，是日常生活社会学最重要的古典思想家。舒茨从根本上把现象学转变为一种关于生活经验的现实世界的现象学，他对生活世界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个体经验的微观分析。“史密斯以舒茨关于社会科学家惯常建构的虚构世界的观点为出发点，详细制定了一个‘依赖于局内人知识’的研究逻辑，‘这些知识是关于她参与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是如何运作，它们如何被组织在一起的。’”<sup>⑧</sup>

舒茨关于视而不见的背后经验或者视为当然世界的存在之研究，是常人方法学的基石。加芬克尔（1967）的目标则是通过视日常生活情景为一种问题来理解常识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常人方法论在史密斯的理论发展中也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史密斯认为对支持统治设置的客观性的探讨，对于女性和其他次要群体来说，不仅是她们理解其世界意义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可能改变它的方式。下面一段话说明了她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和发展了加芬克尔的理论“它提出了一种局内人（insider）社会学，即一种系统地从内部形成的社会意识开始……从对象实际上被定位的地方开始，使我们回到一种出现于、所知于何贯穿于人们持续进行的实际活动的社会世界。”“……从女性的立场来看，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会使日常生活世界问题化。”<sup>⑨</sup>

因而，史密斯的立场理论以现象学方法开始，探讨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体的白天或夜晚日常生活世界，她感兴趣的是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中所经验的男性支配结构，以及女性是如何思考和感觉那些经历的。由这些经验出发，史密斯“认为女性个人的经验在社会理论抽象名词的思考与推理中被否定，而被以男性经验出发的社会理论所取代。这种表面上是客观中性的知识创造，实际是性别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复制过程。当以男性经验为蓝本的理论取得科学地位，且广为社会机制，如教育、社会服务、公共卫生等采纳成为组织日常运作的假设时，社会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就一再地被复制与维持。”<sup>⑩</sup>由以上对传统社会学的反省，史密斯建构了“制度民族志”：“要研究者完整地记录女性的日常经验，但分析的架构却不同于传统的诠释，而是从社会权力结构进行分析，发展属于女性的知识。这种以认知社会不平等关系为前提、以弱势者为研究起点、选择以改变权力关系为目的的研究假设与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批判典范相符。”<sup>⑪</sup>

但是，史密斯并没有对“什么是经验”论述很多，只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经验”这一

概念，论述在组织社会调查时“经验做了什么”。她没有把经验当作世界观或内容主体，因此它成了研究的起点，并且以解构的方式得到了运用。它是（女性）主体的直接经历，是女性所处的那个世界，其中女性被同时置于认识主体的主体地位和可供研究的社会客体的客体地位。这种方法提供了对笛卡儿理性主义话语的评论，同时也批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史密斯从女性角度入手，揭露了这一话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征及父权制特征，从而证实了一点：要想研究更大的社会组织，应从本土的、直接的事物——那就是我们的经验开始。”<sup>⑫</sup>

综上所述，史密斯的立场论试图使现象学与批判理论相结合，以创造一种对女性经验的批判性说明，把这种经验视为处于男性统治的巨大结构之中的东西。然而，史密斯的贡献远不止是对现象学研究方法进行运用与情理，她的立场论社会学还拓展了现象学的方法并超越了这种方法。

#### 四、揭露日常生活中权力支配的统治关系：对福柯式话语分析的拓展

通过研究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权力/知识”体系是如何构建主体及其世界的，迈克尔·福柯将这些体系看作“话语”，具有社会自反性，既构成又有意义地描述了世界及其主体。福柯考掘“知识”与“权力”间的合谋关系：知识是权力运用的基础，而权力运用也会产生知识。尽管福柯几乎没有涉及女权研究，史密斯仍然受到福柯对“权力/知识”的批判所影响，认为当代社会权力的运作是透过知识的型态，且将焦点放在统治机制的运作上。“组织”一词即是指出现代社会组织官僚化的特质。对史密斯而言，对“组织”的分析并不像一般组织行为研究限于特定组织或机关的内部分析，而是更进一步将组织的日常运作模式置于外部社会权力结构下分析，因为组织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上<sup>⑬</sup>。史密斯提醒我们，在实验室、研讨会、政府办公室和出版社，“实际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实际的关系”生产了福柯所谓的“话语”，这些地方在过去（也包括现在），即使并非专属于男人，也是主要由男性构成，这些男性在一种社会性别化的权力关系之中运作，这种操作基于“支配”与“服从”的复杂辩证关系。当然，就学术而言，这些授权也典型地包括了阶级、种族和权力位置中的特权。史密斯认识到了福柯男性气质的立场“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我们想要提出话语是经过文本的交谈中介，它不是陈述本身，而是关系到实际的持续进行的实践和实践的场域，文本的物质形式（如杂志、评论、书籍、会议、课堂或实验室等等），生产文本的方式，有声誉的和地位的结构，其他一些在国家机构、大学、行业组织之类的统治权力关系交织的组织。对话语作为社会组成的关注，并不就意味着要抛弃或是废弃它的文本中所担负的陈述、惯例和知识。相反，文本应该在话语主体及其在话题之间积极的组织关系之中来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是实际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实际的关系。”<sup>⑭</sup>史密斯的“话语”指涉一种关系场域，不只包含文本所含的概念所进行的活动。这样的“话语”概念绝不会在任何时候只看到文本而忽略了在现场启动文本的主体。史密斯要我们了解的是“人”在话语性的活动中积极参与。福柯所说的权力/知识对史密斯而言就是人们以具有知识的态度去认识事物及采取行动时所牵涉的社会关系。当人们以主流支配性话语认知与行动时，规范/统治就隐而不见。

与一般的女性主义者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性别角色体系不同，史密斯强调的是一种被忽视却是核心的社会统治机制：即被客观化了的知识和话语。她通过阐述社会生活的三种层面——统治关系和生活经验的实际处所以及概念的、匿名的、非个人的文本——来论述她的观点。

第一，所谓“统治关系”是指复杂的、不统一的但又错综相连的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

企图控制人类社会生产。统治关系包括了政府、大企业、行业、科学、医学和大众媒体话语以及参与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员等。统治关系展示了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勾结。史密斯关注的是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统治关系之潜在的、共同的核心特征，即知识充当着一种社会支配力量。<sup>⑮</sup>史密斯认为统治机制是一种阶级组织，意味着统治阶级不仅排斥劳工阶层的声​​音，也排斥“女性与有色男人、土著人、男女同性恋的声​​音。从不同的立场看，这种统治机制以及阶层的不同向量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sup>⑯</sup>

第二，所谓“生活经验的实际处所”是指“人类社会生产以它的物质本质而言，……不管是写字、读书（或种菜、织布），都必须有一个处所是某个真实个人所在之地。”<sup>⑰</sup>史密斯断言，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既不同又不平等。而且女性也存在阶级、种族、利益和价值观等社会差异，但这并不妨碍说存在一种共同的性别经验。一般地，和男性相比，女性继续对家庭义务、对照料社会之有形的、物质状况负主要责任，如烧饭、清洁、照顾小孩和男人的身体，以及对自己、小孩和大人、男人和女人、病人和健康人的日常物质照料。女性的生活重心是家庭、家务和护理。

第三，所谓“概念的、匿名的、非个人的文本”是指晚期资本主义的父权统治是通过包含经济、国家和具特权的专业等相互依赖的控制系统制订的，是透过一些根本上的匿名性、概念性和权威性的文本而显示出来，如病历，人口普查报告，住院记录，精神病病例分析报告，婚姻登记，就业档案等。这些文本帮助社会控制。史密斯指出，男人在社会的重要机构或“统治关系”中占据着权力和特权地位。在西方社会，统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所谓“客观知识”。所谓的客观知识，从精神病学到人口普查，是从活生生的个人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的，进而构造出有关个人和群体的一般特征和类别，既然男性的生活是以公共世界为中心的，所以他们认为以抽象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来描画世界是理所当然的。

史密斯指出，以上社会生活的三种层面是社会生活组织和统治组织广泛的、持续的和经常的特性。史密斯倡议她所称的“话语和日常生活的辩证法”。在强调话语的“影响和相互影响”的同时，她清楚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女性应该在其世界中处于“积极的”位置。

## 五、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讨论

首先，女性主义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究竟造成何种影响？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女性在某些领域的缺席和匿名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而社会学理论向来是最慢接受改变——即严肃看待女性主义批判的一个领域。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朱迪思·斯泰西与巴瑞·索恩在合著的文章“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的缺席”（1985）中，指出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重建学科的根本范式这个过程中，成绩并不够显著。

巴巴拉·莱斯利与索恩在《社会学理论》（1992）中组织了一场针对史密斯社会理论的专题讨论，在“思考多萝西·史密斯的社会理论：引论”一文中，她们指出“尽管社会学家在工作、职业、组织和家庭等领域已经认识到女性主义学者的贡献，但是在社会学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之间依然矗立着一个无声的屏障。沉默之墙也许不是最恰当的比喻，因为沉默是单方面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早已吸收与重新利用各种传统的社会理论，……然而社会学理论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著作。”<sup>⑱</sup>史密斯“提出的问题……直达社会学理论的核心，然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社会学理论家从未读过史密斯的著作或者思考过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贡献呢？”<sup>⑲</sup>社会

学家查尔斯·莱默特在“主体性的局限：立场的未解之谜”一文中指出史密斯把主体性概念推向了极端，但是，从女性的立场产生的知识是否过于简单？假如女性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持立场理论的那些研究者是否能真正理解女性“碎片化的身份”？难道真有所谓的女性本质吗<sup>21</sup>？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的“改变核心集团：多萝西·史密斯对社会学的挑战”一文首先强调了史密斯对社会学的冲击力，同时指出史密斯低估了由种族、性别、阶级、性倾向和年龄等边缘化群体所创造的多样性，忽视了由这些群体生产的知识<sup>21</sup>。R. W. 科奈尔的“一个清醒的无政府主义”一文肯定史密斯质疑社会学的实践基础，但也提出“为女性的社会学是否同样适用于为同性恋、为工人、为殖民地人民的社会学”的问题<sup>22</sup>。作为回应，史密斯在“从女性经验出发的社会学：一个重申”一文中，澄清了如何理解和运用从女性经验出发开始进行社会学研究。她坚持自己的理论不是一个总体化的理论。相反，它是一个“探究的方法”，总是不断前进、揭示和发现事物的过程中。另外，重新强调无论是女性还是其他受压迫的群体都与探究、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和实践相关<sup>23</sup>。

1993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把 Jessie Bernard Award 授予了史密斯和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以奖励她们的学术研究对社会中女性角色的深入全面的分析：“……拓展了社会学的边界，把女性的立场、观点和经验与关注包括进来了；……拓展了学术领域，开拓了性别研究领域。他们都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而提出了一种社会学，以期加强女性的力量。”<sup>24</sup>

其次，女性主义社会学对“经验”这一概念的重视，被很多人批评为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第一，个人在本质上被认为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第二，特定的经验观点可能被视为优于其他观点；第三，立场论宣称生产一个较好的真理时是在“科学”的范畴下的努力。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琼·W. 斯科特指出，经验是真实的来源，也是早已存在于那里的描述性证据。因此，她提醒人们，经验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经验被作为知识的起源时，单个主体（具有经验的个人或者记录经验的历史学家）的视觉就成了证据的基石，在这上面，解释建立。”<sup>25</sup>只关注经验就不能考虑经验是怎样产生的，物质、历史和社会环境的特点是什么。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安·奥克利也肯定了“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值得赞扬的女性主义目标，且根本上有助于全面理解社会世界。但是她同时指出，无论是作为女性主义者，或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都不能以现象学式的困境作结。将知识扎根在描述个体经验的危险在于：我们无法超越她们<sup>26</sup>。

一些女性主义者则声称经验是女性主义的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将女性的经验视为论述的起点，并主张“一旦我们允诺要将女性的经验当成产生科学问题、假说与证据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依此设计出专为女性设计的研究，并将研究者放在与研究主体相同的批判层级时，我们就不可能做出传统的知识的假定。”<sup>27</sup>另外，后马克思主义者唐娜·哈拉维所描述的“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与经验的概念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由某个地方所生产而来——所有知识都是“情境化的”。必须以女性生活的实际定位出发，而不是以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生活出发。“……反对各种形式的无法定位，并因此不负责任的知识宣称。……建立从边缘与深处观看的能力，会获得奖赏。”<sup>28</sup>

总之，以史密斯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的研究创造出一些议题：女性主义社会学不应只是采用传统社会学的工具——方法论、概念与理论，还要超越“把性别加进去搅一搅”（add gender in）<sup>29</sup>的分析方式，并带着批判性与反思性，擦拭这些工具使其发亮，为女性主义本身增加一些工具：自反性、自我认同的性别感的建构、后现代的解构等。正如奥德·洛德所说“主人

的工具将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屋”<sup>⑩</sup>。

① Anne Witz, The feminist challenge, in Ballard, C., Gubbay, J. and Middleton, C. (eds),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ology*, Blackwell, 1997, pp. 114 - 120.

②③⑤⑥⑦⑭⑯ Dorothy Smith,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 p. 55, p. 80, p. 107, p. 123, p. 214, p. 107.

④ 帕特里夏·提茜奈托·克拉夫 《女性主义思想: 欲望、权力及学术论述》, 夏传位译, 台北: 巨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97年, 第133页。

⑧ 乔治·瑞泽尔主编 《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 凌琪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88页。

⑨⑭ 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 《当代社会学理论: 对古典理论的扩展》, 刘少杰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60页; 第258页。

⑩⑪⑬ 王增勇 《讲义十一: 建制民族志学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ww2.coolloud.org.tw/user/social/xoops/modules/newbb/dl\\_attachment.php?attachid=1166864233&post\\_id=2558](http://www2.coolloud.org.tw/user/social/xoops/modules/newbb/dl_attachment.php?attachid=1166864233&post_id=2558).

⑫ 帕米拉·麦考勒姆、谢少波选编 《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 蓝仁哲、韩启群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第157页。

⑮ 史蒂文·赛德曼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刘北成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214页。

⑰ 乔治·瑞泽尔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 杨淑娇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73页。

⑬⑱ Barbara Laslett & Barrie Thorne, Considering Dorothy Smith's Social Theory: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0 (1): p. 60, p. 61.

⑳ Charles Lemert, Subjectivity's Limit: The Unsolved Riddle of the Standpoint.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0 (1):

pp. 63 - 72.

㉑ Patricia Hill Collins,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ircle: Dorothy Smith's Challenge to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0 (1): pp. 73 - 80.

㉒ R. W. Connell, A Sober Anarchism,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0 (1): pp. 81 - 87.

㉓ Dorothy Smith, Sociology From Women's Experience: A Reaffi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10 (1): pp. 88 - 98.

㉔ 琼·W. 斯科特 《经验的证据》, 蔡一平译, 佩吉·麦克拉肯主编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62页。

㉕ Ann Oakley, Gender, Methodology and People's Ways of Knowing: Some Problems with Feminism and the Paradigm Debate in Social Science, *Sociology*, 1998, 32: pp. 707 - 731.

㉖ 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1.

㉗ Haraway Donna,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t and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Feminist Studies*, Vol. 14, No. 3. (Autumn, 1988), p. 583.

㉘ Charlotte Bunch, *Passionate Politics: Feminist Theory in A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 140.

㉙ Audre Lorde, *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in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rumansburg, N. Y.: Crossing Press, 1984.

作者简介: 戴雪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 左晓斯]